

精装珍藏版

一部通览日本文化、解读其矛盾性格的惊世之作

【美】本尼迪克特 (Benedict R.) 著

田伟华 译

# 菊与刀

Ju Yu Dao



中国书店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出版社

# 菊与刀

【美】本尼迪克特 (Benedict R.)

田伟华

译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菊与刀/ (美) 本尼迪克特 (Benedict, R.) 著; 田伟华译.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146 - 0130 - 5

I. ①菊… II. ①本…②田… III. ①民族文化 - 研究 - 日本 IV. ①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7772 号

## 菊与刀

出版人: 田 辉

作者: (美) 本尼迪克特 (Benedict, R.)

责任编辑: 梅 逸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8)

电 话: 010 - 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 - 68469781 (发行部)  
010 - 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 [cpqh1985@126.com](mailto:cpqh1985@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7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46 - 0130 - 5

定 价: 28.00 元 (精装)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 前 言 ←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美国人类学家，是20世纪初为数不多的女性学者之一，受到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的影响，同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最早提出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

1887年6月6日，鲁思·本尼迪克特出生于纽约市，本名鲁思·富尔顿。父亲弗雷迪·富尔顿是名外科医生，母亲碧翠丝·夏塔克则受过高等教育。鲁思一岁时，父亲染上怪病，全家被迫迁往雪南哥山谷的农庄与祖父母居住。第二年，妹妹玛洁莉·富尔顿诞生，几星期后父亲病逝，全家顿时陷入贫困之中。

母亲为了养家，在鲁思五岁时便到附近的诺维镇上做了一名教师，并兼任图书馆员的工作。1894年，为了配合工作需要，母亲带着她和妹妹迁居到蒙大拿州、明尼苏达州和水牛城等地，暑假时又回到娘家与一位寡居的阿姨同住。高中时，鲁思开始从事写作。由于患有轻微的重听，小时候的鲁思反应有些迟钝，常被亲戚和其他人误认为有些痴呆，因而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但也养成了她文静甚至孤僻的个性。

1905年，鲁思与妹妹一同就读于瓦萨学院，主修英国文学。1909年自学院毕业后，鲁思同母亲居住在水牛城，并在慈善组织会社工作一年，然后又前往洛杉矶的西湖女子学校任教一年，隔年又前往加州的帕萨迪纳教书。1913年，鲁思与康奈尔威尔医学院的生物化学家史坦利·本尼迪克特坠入情网，两人于1914年结婚。

1919年，在前往社会研究新学院旁听了人类学家艾尔丝·帕森思和亚历山大·戈登怀瑟的课程之后，鲁思·本尼迪克特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因此1921年鲁思·本尼迪克特决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在法兰兹·鲍亚士指导下学习三个学期。由于当时已年满35岁，依校方规定无法领取奖学金，因此必须兼任编辑和教师职务才能维持生活，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大学附近租了一栋小房子住。1922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她接任法兰兹·鲍亚士的助教，同时继续旁听鲍亚士的课程。

1923年，鲁思·本尼迪克特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讲师，并讲授了几门美术课程。1924年夏天，她首次到祖尼人部落进行田野调查，1925年夏天她到柯契地族和皮马族进行调查，1931年又带领学生到马斯卡罗族进行研究。在这些短期田野调查之中，鲁思一方面纪录整理了大量即将消失的传说和仪式，另一方面又逐渐构思出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想法。

1931年，鲁思·本尼迪克特正式与丈夫史坦利·本尼迪克特分居，同年接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的职业。

1932年，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出版。在著作中，鲁思描述了三个种族（普布罗族、多布族和夸奇乌托族国）不同的文化，并引用尼采的论述，以日神型、酒神型与夸大妄想型这三种人格特质分析三个民族的性格，并认为文化本身其实如同个人，可以分成许多不同的人格类型，每种类型使文化产生不同的差异，也塑造出民族集体的性格。由此引申，她暗示出了强烈的文化相对论观点：每种文化各有自身的特性，因此不存在谁好谁坏，谁优谁劣的绝对判别。另外，鲁思引用了大量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的术语与观点描述文化，并首先把个人的文化适应与成长置入研究文化的项目之中。这在当时的人类学界引起相当大的讨论，也对鲁思·本尼迪克特之后



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

1939年暑假，鲁思·本尼迪克特带领学生到黑足族进行田野调查后，回到加州的姨妈家休假一年，同时专心撰写《种族：科学与政治》，希望透过该书表达反对纳粹种族中心论的立场。隔年秋天，她受布林茅尔学院邀请发表了以“和谐”（Synergy）为题的演讲，借此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谐为促进人类进步之社会，与此相反者则为恶，应为人们所唾弃。

1941年，随着战事日渐升温，鲁思·本尼迪克特被邀请担任国家研究会饮食习惯委员会委员，开始研究文化与饮食之间的关系。在这段时间内，她逐渐展开对国民性格的研究，并提出一些报告与摘要。1943年，鲁思开始接触各参战国的文化资料，并出版了一系列介绍罗马尼亚、泰国等国的著作，以及名为《人类的种族》的小册子。

由于遭到排挤，鲁思放弃欧洲文化的研究，转而投入研究日本文化的团队，由于她巧妙回避掉当时研究者对心理学研究方式的论战，使其成果远远比他人丰硕。1945年，她请假回到加州专心写作《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并于隔年完书付梓。

《菊与刀》是鲁思·本尼迪克特以文化遥距研究法做出来的成果：她从当时日本发布的宣传电影、集中营中的日裔美国人和战俘的访谈纪录以及日本人的文学作品中收集资料，重新建构出日本文化以及对日本战后重建的期许。书中，她不但以文化形貌论谈论了日本文化的特质，还从孩子教养的角度剖析日本人的生命史，其细腻的描述摆脱了学术上的论战，开启了西方对日本文化的研究热潮，使得战前对日本一无所知的情形彻底扭转过来。《菊与刀》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接管政策，其中如保留日本天皇等建议都为当局所接受。



1946年6月，鲁思·本尼迪克特荣获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颁发的杰出女性奖，同年秋天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并被选为美国人类学学会主席，同时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当代文化研究”的研究计划。1947年7月1日，鲁思·本尼迪克特正式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教授。

由于计划庞大复杂，任职的系所又不支持，鲁思被迫整天忙于公务。1948年5月，在出席完联合国文教组织在捷克波德布拉迪举行的研讨会的第二天便罹患冠状血栓症。五天之后病逝于医院，享年61岁。1995年10月20日，美国邮政服务公司为了纪念她的贡献，发行了一套印有她头像图案的邮票。



.....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001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015
第三章 各得其所.....	031
第四章 明治维新.....	053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负债者.....	067
第六章 报恩之万一.....	0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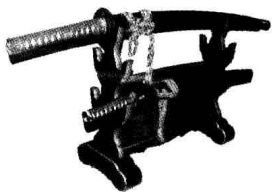




# 目 录.....

第七章 “最难承受的情理”.....	093
第八章 洗刷污名.....	101
第九章 人的感官世界.....	123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135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157
第十二章 儿童学习.....	173
第十三章 投降以来的日本人.....	203





## 第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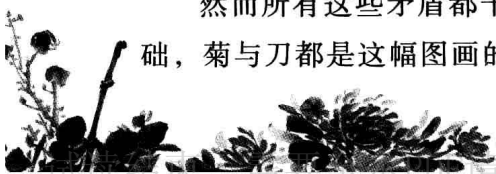
### 任务——研究日本



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为古怪的。在其他任何战争中，美国都没有必要去考虑其主要对手的一些截然不同的行为和思维习惯。如同1905年那场与俄国人之间的战争，我们同样与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体系但是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国家战斗。很显然，日本人并不具备西方国家所公认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我们必须认识到太平洋战争不仅是一系列海岛登陆战，不仅是一场艰难的后勤服务战，为了对付日本，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行事方式。

困难超乎想象。自从日本放弃闭关锁国，开放门户75年来，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但是”之类的词语被用于描述日本人，这是对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有过的。一位严谨的评论家论及日本人之外的其他族裔，他不会说他们空前的礼貌，又加上一句：“但是他们蛮横、骄傲自大。”当他说到他们在行为上无比刻板时，他不会补充：“但是他们很容易接受激烈的革新。”当他认为他们温驯时，他不会过多解释他们并不容易接受上级的控制。他不会既说他们高贵宽厚，又声明他们粗鲁、睚眦必报；也不会既说他们勇敢异常，又细述他们的怯懦、不坚定；也不会既说他们不介意别人的意见、自行其是，又说他们极具是非心；也不会既说他们的军队中有着机器人般铁的纪律，又描述军队中的士兵是如何不服从管教；也不会既说他们热心于西方学识，又强调他们的极端保守。他不会既写一本书讲述该民族是如何爱美，如何给予演员、艺术家以及培育菊花的艺术以崇高评价，又写一本书来说明这个民族是如何醉心于刀剑文化和武士的至高荣誉。

然而所有这些矛盾都千真万确，而且是有关日本论著的基础，菊与刀都是这幅图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既好斗又非常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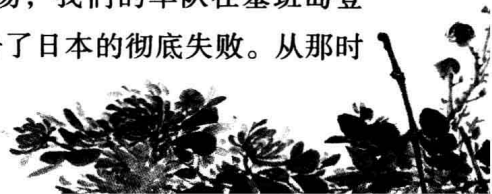


和；尚武又非常爱美；粗暴又非常有礼貌；刻板又非常懂得变通；温顺又非常叛逆；高贵又非常粗俗；勇敢又非常怯懦；保守又热心于新鲜事物。他们非常在意别人对他们行为的看法，而当别人对他们的过失一无所知时，他们心里会充满了罪恶感。他们的士兵受到了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既然美国意识到了了解日本人的重要性，那么上述尖锐的矛盾及其他许多令人头疼的问题都不能置之不理。严重的事态接踵而至，日本人将采取什么行动？我们不进攻日本，日本有无可能投降？我们应该轰炸皇宫吗？我们该如何处置日本战犯？在我们的宣传资料中，我们该如何劝说日本军队、日本国民以挽救美国人的性命，又该如何教化那些一意顽抗到底的日本人？当和平到来之时，日本还需要永远的军事管制来维持秩序吗？我们的军队有必要为了打击那些隐匿在日本深山老林中的疯狂抵抗分子而备战吗？世界和平降临之前，有必要效仿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在日本也掀起一场大革命吗？由谁来领导呢？彻底消灭日本也是选择之一吗？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肯定是众说纷纭的。

1944年6月，我被委任做日本研究，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所有技术去解读日本人的真实面目。初夏，我国对日本的大规模进攻刚刚拉开序幕，美国人大多认为对日战争将持续三年或者十年，甚至更长。日本方面则认为这场战争将持续一百年，在他们看来，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本土甚远，故而美国只能取得局部胜利。他们的官方公报从未承认海军的失败，日本民众仍然认为他们是胜利者。

然而，进入6月以后，战局开始转变。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最高司令部两年半来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无必要，对德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在太平洋战场，我们的军队在塞班岛登陆，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宣告了日本的彻底失败。从那时



起，我们的士兵便日益与日军短兵相接。通过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的战役，我们清楚认识到了与我们对抗的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敌人。

因此1944年6月，弄清楚关于我们的敌人——日本的一系列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疑问无论是军事上的，还是外交上的，也无论那是出自最高决策的要求，还是出自在日本前线散布宣传册的需要，都必须提出真知灼见。在这样一场对日本的全力以赴的战争中，我们要了解的不仅是东京当权者在军事上的意图和目标，不仅是日本的悠久历史，也不仅是军事、经济上的数据统计，我们必须清楚日本政府从他们的人民那里指望什么。我们必须努力理解日本人思想和情感上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还必须了解这些行为和观念背后的约束力。我们必须把我们作为美国人的前提放到一边，避免轻易得出结论，认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会怎样做，日本人又会怎样做。

我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美国、日本在交战中，虽说战时把一切问题归咎于敌对国非常容易，但要想知道敌人自己心目中对人生的看法就难得多了。然而这件事还是必须得做。问题是日本人是如何行动的，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上会怎么做。我必须设法用日本人战争中的行为，作为了解他们的“正值”即有用的资料来加以利用，而不是作为不利条件看待。我必须观察他们引导战争的方式，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与和平中一样，日本人战时的行为也自有其日本特色。他们对待战争表现了哪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特征？他们的领导人鞭策战争精神、消除国民惶惑，以及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他们自以为可资利用的力量是什么？我必须认真研究战争中的细节，来观察日本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暴露自己。

我们两国交战这个事实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极大的弊端。这意



意味着我必须放弃文化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考察。我不能去日本，住在当地观察日常生活的各种习气，用自己的双眼观察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我也无法看到他们在做出一个决定时的复杂心态，无法看到他们的孩子是如何成长的。另一个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关于日本乡村的学术研究专著——《须惠村》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1944年我们面对的关于日本的许多问题在该书写作中都没有提及。

尽管存在着这些重大困难，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仍然对目前可用的方法、技能很有信心。至少我不必放弃人类学家在与他所研究的对象进行面对面交流时拥有的那份信任感。在美国有大量的日本人，他们在日本长大，故而我可以向他们了解他们亲身经历的详情，发现他们对自己进行判断的方法，根据他们的描述填补我们知识中的疏漏之处，对人类学家而言，这一点在理解别国文化上是很重要的。其他研究日本的社会学家大都利用图书馆的资料，分析过往的事件、数据，或是参考日本宣传资料上的只言片语。我相信他们所企求的许多结论都暗含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观中，因此从在日本真正住过的人身上探讨日本文化，结论会更加令人满意。

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阅读，也不意味着我不感激那些在日本居住过的西方人。日本博大的文化和大量居住在日本的西方观察者给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这是去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研究无文字部落的人类学家未曾享受过的。这些部落没有文字，无法用文笔来表现自我。西方人的评论极少且流于表面，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专业研究者必须在没有任何先前学者的帮助下，完全自己去探索他们的经济生活运行方式，他们的社会阶层是如何形成的，他们的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我吸收了许多学者的成果。对生活细节的描述写满古卷；来自欧美的人们记载了他们生活中有趣的经验；日



本人则记录了那些异常真实的自我。与许多东方人不同，日本人有强烈的描写自我的冲动，他们记录了生活中的点滴，记录了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他们出乎寻常地坦率，当然他们没有展示出自我的全貌，也没有人能这样做。一个描写日本的日本人通常会忽略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些事对他而言很平常，在他看来就像他呼吸的空气那样自然。美国人在描写美国的时候也会这样做。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是喜欢暴露自己的。

我阅读这些文献时，如同达尔文说他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的那种读书方法，即特别注意那些无法了解的事情。对议会演说中的一大堆观念的罗列，我需要知道些什么？他们为什么对一些无足轻重的行为大肆攻击，而对骇人听闻的暴行却满不介意，这种态度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我边读边想，“这幅图画的问题”在哪？为了解，我必须知道些什么？

我也去看那些在日本拍摄的电影——宣传片，历史片，有关东京日常生活和农场生活的片子，然后再和那些曾经在日本看过类似电影的日本人一起仔细讨论，他们无论如何都能以日本人的立场，而不是以我的眼光看待片中的男女主角和反派人物。当我对电影某些细节茫然不知时，他们却显然不是如此。情节、情节发展的动力和我所想并不一致，但他们却能按照电影构思的观点去理解。至于小说呢，我领会的和日本读者领会的意义之间则有更多的不同。这些日本人中有一部分很快就表现出日本习俗的防御性，另一部分则憎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从哪一个群体我理解的更多。但他们所描绘的日本生活规范的景象则是一致的，不论他们是欣然接受，还是痛加排斥。

如果人类学家只是直接从他所研究的文化对象搜集资料并寻求解释，他所做的与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最有能力的西方评论者所做的全部研究毫无区别。如果一个人类学家所能贡献的仅止于



此，那么就不能指望他在以往外国旅居者有关日本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更有价值的结论。然而文化人类学家由于接受过训练，具备某种特殊能力，因此能够在这一拥有大量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做出他特有的贡献。

人类学家了解关于亚洲和大洋洲的文化。日本有许多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甚至和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有着紧密联系。这些联系，有些体现在马来西亚，有些在新几内亚，也有些是在波尼西亚。思考这些联系是否体现了古代的移民或者相互接触当然是很有趣的，但这对我来说，了解文化相似性之所以有价值却并不在于这类可能发生的历史关联，而在于能够凭借这些类似或差异，获得理解日本生活方式的启示，因为，我懂得这些风俗习惯在简单的文化中是如何起作用的。我对亚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如暹罗、缅甸及中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而可以把日本与其他民族进行比较，这些民族都是亚洲伟大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人类学家已经不止一次在他们对原住民的研究专著中指出这些文化对比是多么的有价值。一个部落可能和它的邻近部落在正式习俗上有90%的相似，然而它也会按照自己的需要逐渐修改从而形成与邻近部落截然不同的价值标准。在这个过程中，她不得不排斥一些基本习俗，尽管其对整体而言比率很小，却可以把整个未来的发展规范在一个特定的方向上。对人类学家而言，没有什么比研究这种在整体上相似的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更有益的了。

人类学家也必须使自己最大限度地适应自我文化和他者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且他的研究技术必须为解决这一特殊难题而加以磨练。他们凭借经验知道，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所面对的情况必有差异，不同的部落、国家对这些情况的判断方式也必有不同，在某些北极的乡村或者热带沙漠地区，他们会遇到以血缘责任或财务交换为基础的部落习俗，远非任何丰富的想象力所能想象





的。人类学家必须进行调查，不仅要调查亲属关系和财务交换的具体细节，而且要调查部落行为的后果以及每一代人如何从孩提时代起就开始自我约束，世代相传，如同其祖先所做的那样。

人类学家对这种差异、约束及其后果的关注，在研究日本时也可以加以利用。人人都明白美国和日本之间根深蒂固的差异，我们甚至有过这样的关于日本人的传言：“我们无论做什么，日本人一定反其道行之。”一个研究者如果相信这种说法，简单地认为这些差异是如此怪异，那么就不可能理解日本人，这种想法当然是危险的。人类学家自身的经验就能很好地证明，即使最古怪的行为也不能妨碍研究者对它的理解。人类学家比其他社会学家更能有效地利用这些差异作为有用的资料，引起他们注意的也恰恰是那些表现离奇的制度和民族之间的差异。他们不会想当然地看待部落的生活方式，他们关注的不仅是少数选出的事实，而是一切细节。在研究西方民族之时，一个未接受过比较文化知识培训的人往往会忽视从整体上去把握行为。他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不需要去挖掘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习惯，不用在意那些人们对熟悉事物的公认说法。事实上，正是这些习惯以及公认说法大面积地投射在民族背景之上，其对民族未来的影响力远甚于外交官们签署的种种条约。

人类学家必须训练研究日常琐事技能，因为他所研究的这些日常琐事与他本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当他试图理解某一部落中视为最恶毒的或另一部族中被视为最胆怯的行为时，当他试图了解在特定情况下他们是如何行动、如何感受时，他发现他不得不投入很大的精力在细节上，这些，在对文明民族进行研究时，通常是不为人注意的。人类学家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些细节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也知道如何依据这些细节进行深入挖掘。

在对日本进行研究时，这种尝试是值得的。因为只有当一

